

文庫博物館專集（三十七）

最近，曾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1949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

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为研究者探讨这些重大事件、研究 50—60 年代北京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

随着“三年自然灾害”接近尾声，中共的政治生态环境也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毛主席”之外，“刘主席”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场合，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已完全明确。

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对地方的指导方式上，与毛泽东有某种差别，刘少奇对地方工作一般不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但是，随著刘少奇在党内影响的扩大，情况也逐渐发生变化。1964 年，刘少奇为指导“四清”运动，给江渭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具有某种直接干预的性质，导致了极其复杂的结果，使得江渭清被卷入 1964—1965 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旋涡中。

在 50 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刘少奇曾因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在政治上一度陷于低谷。直至 1959 年，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他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巩固。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标志着他在 50 年代初中期受挫后，开始了权力复苏和扩张的过程。到了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已有逼近毛泽东之势。也正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派出了原北方局系统的李葆华主政安徽，取代了毛泽东的老部下曾希圣（曾希圣因积极推动大跃进受毛特别信用，后来因率先推行责任田而被毛抛弃）。但是李葆华入皖，并不表明刘少奇在华东地区已建立了完全的影响力，因为主政华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自恃有毛泽东作后台，并不买刘少奇的帐。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毛泽东均心中有数。

柯庆施自 1949 年后长期在华东工作，与江渭清有同僚之谊。柯庆施虽对江渭清时有压力（催促“反右倾”），但并不具体干涉江渭清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华东地区既已有了谭震林、柯庆施这两道屏障，刘少奇自然对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千人大会”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刘少奇的影响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毛泽东再度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在 1962 年 8 月的北戴河会议和继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向党内健康力量发起反击，威逼全党就范。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反击毫无抵抗，他随即作了“自我批评”，紧跟着毛泽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进而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63 年 2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总是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11 月，刘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前往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成果，就是产生了轰动一时的“桃园经验”，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桃园经验”，刘少奇与江渭清发生了争执，毛、刘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

1964 年 6 月底，刘少奇带着王光美离开北京，前往十一个省市巡视指导运动，并由王光美在各地党政干部大会上做介绍“桃园经验”的报告。7 月 14 日，刘少奇等来到南京，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下。

刘少奇此行来势猛烈。据江渭清记述，当刘少奇抵达济南时，华东局即派书记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刘少奇一行至合肥。魏文伯与江渭清是老同事，特从合肥打电话给江渭清通气，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因为刘少奇一路“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刘少奇在南京“开讲”了两个下午，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刘少奇还反覆强调，领导干部若不蹲点，就没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江渭清虽然事先有魏文伯的电话通气，但是既有前几年面折毛泽东的勇气，对刘少奇也就不惧当面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认为江苏的运动打了败仗，江渭清坚持说，不能这么讲，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江渭清又说，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反驳道：“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寸步不让，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

就在江渭清与刘少奇这番辩驳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少奇当即打断江渭清，转问他对王光美的报告有甚么看法，因为江渭清没有出席并主持江苏省的王光美的报告大会。刘少奇逼问江渭清：“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江渭清给刘少奇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更进一步追问：“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江渭清的这番回答，引致刘少奇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在刘少奇离开前夕，“脾气”终于爆发。刘少奇明确告诉江渭清，他的意见“是不对的”，江渭清则坚持原来的看法，两人发生顶撞。返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分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而在会议之前的7月29日，平日较为谨慎、因“桃园经验”一时跃入政治舞台中心的王光美，竟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揭发“高沟事件”本是江苏省委在北京压力下为顺应“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加工提高的产物，现在刘少奇抓住这个事件，就是为了证明他对基层政权已烂掉的看法的正确性，并且要以此“事件”为起点，继续挖出上面的“根子”。

刘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箭，是抓住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发出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提到“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善始善终抓好社教运动。刘少奇当面质问江渭清：“为甚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刘少奇这一招确实击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可以抬出毛泽东为自己辩护，刘少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刘少奇的这番追问，江渭清极为紧张，他立即向刘少奇作了解释。这一次，连一向对刘少奇阳奉阴违的柯庆施也发了慌。一旦刘少奇又以“护法大师”的面目出现，柯庆施则不得不退避三舍，他一连打三个电话逼江渭清非作检讨不可。

此时的刘少奇已走出1962年下半年的低谷，正走向新的权力高峰。江渭清返宁后迅速布置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并且亲自下乡蹲点。到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汇报全省运动进展情况，并且特别报告了根据刘的指示，正在研究处理“高沟事件”，又一次就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发出的通知作出检讨。

刘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后，于9月23日覆信给江。刘少奇在这封信中首先针对江渭清信中所写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一段话，表示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刘少奇提出“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他并举例应学习由中央批转的解

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大庆油田经验和“桃园经验”。刘少奇解释他之所以反对学习江渭清那篇讲话，是因为江渭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在江渭清的回忆中省略了当年刘少奇信中有关对他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其实，这正是刘少奇信的要旨所在，也是导致毛泽东疑忌刘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少奇在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因此，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那篇讲话“不值得学习”。

1964年刘少奇将全副精力放在社教运动上，他试图在毛泽东的框架内放入某种含有他个人色彩的内容，“桃园经验”的产生即是他这种“新思维”的果实。但是，地方领导人各有其复杂背景，即使在1962年后党内日趋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各地方领导人仍存有管道联系，以应对北京层出不穷的政策变化。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中，任何与毛的话语稍有差异的言辞都能被地方领导人立即识辨出来，作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在山东、安徽和江苏都“发了脾气”。为了与影响正日益上升的林彪相抗衡，刘少奇作出最后一搏。他试图以江渭清做鞭子，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降温。1964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文革前最后一个强势动作出台，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刘少奇还派出他的老部下、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等来江苏检查和指导四清运动。薛暮桥等曾写信批评江渭清和江苏省委的检查没有“把认真讨论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倾结合起来”，没有“抓住省委在指导运动中的一些突出的错误事件进行分析和解剖”（薛暮桥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对此段史实只字不提）。据（江苏省长）惠浴宇回忆，这个由北京派出的“来头很大的工作组”在淮阴搞“四清”，执意要把“一个县委和该县所属几十个公社领导”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惠浴宇在这里指的就是涟水县委。该县委的直接上级淮阴地委书记孙振华向省委陈情，要求保护这批干部，得到省委的支持，但孙振华却因此“搞坏了”与北京“某些领导人的关系”，不久便被调往安徽巢湖地委工作。此时若非形势忽然发生转折，针对江渭清的动作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1964年12月，北京形势丕变，毛泽东出尔反尔，一改原先支持刘少奇的态度，转而和刘少奇发生对立。自1963年秋王光美蹲点桃园，刘少奇全力支持四清运动近一年时间里，毛对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刘少奇，乃是刘少奇的左调均来源于毛本人，刘少奇的若干“新语言”，也是在毛的左调基础上的发挥。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显得心满意足。事实正是如此，刘少奇的言论皆有源可稽：1964年初，王光美向毛汇报桃园大队的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毛泽东说，根子在上面。“扎根串联”一说，最早版本也属于毛泽东。早在1961年1月，毛就提到要派大批干部下乡，深入“扎根串联”。1963年5月，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要采取扎根串联，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全国1/3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1964年8月底，毛同意向全党转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还称赞过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写下批语。毛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毛泽东并对刘少奇的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具有毛氏特色的领袖型哲学训示，并指出如不这么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江渭清回忆录》完全回避毛曾参与刘少奇信一事。）

毛泽东为甚么忽然转变对刘少奇的态度？结合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一系列举措，即可发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乃是事出有因、有迹可循的。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1)蹲点问题。刘少奇在1964年夏四处游说，其间还曾返回北京，于8月1日向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讲过一次。刘少奇

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这段期间，刘还反复强调，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四清的发言权。刘少奇的这些话本无影射毛泽东之意，但是在极度敏感的毛那里，刘少奇的这番话用意险恶，有逼宫之意。在中共上层人人皆知，1961年刘少奇曾在湖南宁乡老家蹲点44天，而毛从未蹲过点。(2)“调查会过时论”。刘少奇宣扬，深入了解基层的不二法门是“扎根串联”，开调查会已不能接触农村真实情况，因为基层干部大多有问题。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如今刘少奇予以否定，被认为有贬毛之意。(3)批江渭清的教条主义问题。刘少奇批评江渭清将毛泽东著作当作教条，矛头直指对毛的个人崇拜潮流，明打江渭清，实攻毛和林彪。(4)“大捧王光美”。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王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5)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1964年12月15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大区书记和各省委书记。正在蹲点的江渭清没有接到参加会议通知，原计划由陈毅来华东时向江渭清传达会议精神，而其他地方领导人则中断蹲点，前往北京赴会。显然，不让江渭清与会可能具有某种含意，毛泽东当即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命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当时谁也没料到毛泽东几天以后会向刘少奇发起突然袭击。

1964年12月20日，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当前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到这里，忽然打断刘少奇，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毛泽东随即严厉指责四清运动中的“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等方法。

过了几天，12月26日，毛泽东又在他的71岁生日宴会上不指名地指责刘少奇：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云云。

江渭清在回忆中提到，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江渭清面谈，问到他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也许毛泽东已觉得再没有必要搞障眼法，干脆把与刘少奇的矛盾在江渭清面前挑明。会议期间，毛泽东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误的。”

接下来的，就是毛泽东向刘少奇的连番进攻。1964年12月28日，1965年1月3日、5日，毛泽东连续攻击刘少奇，最后以《二十三条》文件的形式将毛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进去。刘少奇在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其威信遭到沉重打击。

从1965年1月起，在形式上，刘少奇虽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但是在党内地位已日益衰弱。据其他资料透露，1965年初，刘少奇在周恩来、贺龙找他谈话希望他主动向毛泽东致歉后，曾找机会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似乎宽谅了刘。在这此后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一些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了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然而，这是毛泽东故意施放出的烟幕弹，毛泽东已决定要搞掉刘少奇。1965年夏，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将由别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出。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1965年秋，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已赋闲几年的王稼祥，周恩来对王稼祥说，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

1965年11月，毛泽东离京，开始他“南下云梦”，密谋倒刘的部署。不久，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这份文件是哪一个地方领导人通报给刘少奇的？近年披露此则消息的是刘少奇当年的机要秘书，但他未加以说明。据这份神秘的文件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四清运动时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毛泽东的这番话扑朔迷离、暗藏玄机，对王光美的不满是明白无误的了。“我说不行，他说行”，是指刘少奇支持“桃园经验”，毛反对“桃园经验”，还是别有所指，毛故意闪烁其辞；“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是否暗示不要把他的话传给刘少奇？总之，毛为搞掉刘，实际上已向地方官员“打招呼”了。

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毛泽东1965年11月16日来到南京，江渭清向毛汇报时仍说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少奇同志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大为惊讶，问道：“你们还要做检讨？”江渭清按照官式语言回答：“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

江渭清在毛、刘之间四平八稳的态度，无疑使毛泽东更坚定了把刘少奇搞下台的意愿。自1964年12月，毛泽东当面向江渭清表明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已经过去一年，地方大员仍将刘少奇奉为神明，依旧按照党内的某种统一风格，在说着“老话”，这一切都令毛泽东对由他一手创造的庞大的党机器产生出强烈的排斥。在毛想像中的世界里，刘少奇已严密控制了全党，而毛泽东的话已到了差不多没人听的地步。刘少奇下台后，毛泽东在历数刘少奇“罪状”时，曾经提到刘少奇责难江渭清一事。1966年10月24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汇报会议上，指责“少奇说江渭清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为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指责刘少奇一事，在江渭清的回忆中只字不提）。看来，围绕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对毛刺激颇深，这也是毛泽东在扳倒刘少奇后，仍将各级领导干部“一锅煮”的原因之一。江渭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文革中，毛同意“点名”批判江渭清，但又不要将老干部完全打倒，这使他感到费解。其实，毛只是要“教育”他们一番，要他们为昔日“听少奇的话”付出代价。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围绕四清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孰是孰非？一般认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乃是为了保护干部。然而事实上，刘少奇在1964年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其言辞之左，与1947年刘少奇主持老区土改的过左政策如出一辙。1964年在大陆各城市普遍上映的电影《夺印》，和被四清工作队员视为“干部必读”的陈登科的小说《风雷》，均反映了刘少奇当时左的观点。刘少奇虽没有提出“走资派”的概

念，但其左的精神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正是因为刘少奇的左调与毛的左调基本合拍，当时参加制订《二十三条》的各地负责人，对该文件中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无特别的感觉。

1964年，刘少奇意欲在毛的框架下搞出新花样，并试图抗衡林彪。然而，在毛划的小圈圈内做文章又谈何容易？刘少奇的迂回天地狭窄，注定跳不出毛的如来佛掌心。刘少奇本欲求神，却把灾难请下来，这也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在中共核心层领导中，刘少奇素有个性严谨、善于自制的名声，其实刘少奇的谦和多表现在他受毛泽东的指责以后。1953年高岗四处游说反刘，当毛抛弃高岗后，刘少奇仍坚持要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1965—1966年文革前夕，刘少奇更是表现得特别平和、低调，他知道毛泽东对其不满，但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而是一有机会就进行检讨。1966年5月，毛泽东依例让刘少奇主持清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5月26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将自己从1927—1965年所犯的“缺点错误”事无巨细通盘鞭挞一遍。刘少奇几乎是默默忍受毛泽东对他的封锁和打压，而在1964年他的权力趋于高峰时，他可以从济南、合肥到南京，一路“发脾气”。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踌躇满志地在抖落他对刘少奇的怨恨。毛泽东口口声声说，他退居二线有意大权旁落，是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其意在表明，刘不堪造就，辜负了他的栽培。然而，毛泽东何时真正退至二线？大政方针、用人大权，毛泽东何尝一天松过手！当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积累的威望和影响力在1964年有相当发展时，毛就决定要废黜刘少奇，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

毛泽东惦记着江渭清。1967年2月，毛命周恩来用专机将江渭清等几个华东地区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的京西宾馆，使江渭清摆脱了被造反派批斗之苦。1975年，毛泽东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为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直至1982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转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摘自《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原载香港《廿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四月号·第四十六期)

~~~~~

【史海钩沉】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反修”斗争发轫三十年祭

• 吴逸夫 •

三十年前（1963年）的六月七日，《人民日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公开刊登了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拉开了中苏意识形态公开大论战的序幕。

在中苏公开大论战之前，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召开了规模空前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此后不久，苏联又把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东欧到东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六十年代古巴革命的成功又使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扩大为横跨欧、亚、拉美三大洲的政治联盟。可惜，与此同时，在这表面的“东风压倒西风”的一派大好形势之下，中苏两党开始发生所谓意识形态的分歧，分歧由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中苏公开大论战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阵营已完全分裂、瓦解而不复存在。可以说，国际共运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过程中，中苏两党大规模公开论战是关键转折点。然而，中苏论战的意义决不限于这一国际政治格局的根本转变。这一论战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育是多方面的。

## 一、重温“反修”斗争

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苏共中央于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了答复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组织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就是所谓著名的“九评”，以下是它们的题目和发表日期：

- (一) 苏共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 (二) 关于斯大林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 (三)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 (四)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
- (五)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两条不同战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 (六) 和平共处的两种针锋相对的策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
- (七)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 (八)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
- (九) 论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

大致上说来，前四评分析苏共如何背叛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后面四评论述中共如何坚持原则和苏共斗争，最后的第九评则是总结。今天年龄四十以上的人，对这些评论的基本内容应该是记忆犹新的。不过毕竟年长日久，对其中的具体词句有些模糊淡薄，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地帮大家温习一下。

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据一评所说，起自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二是在公开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强调了“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且强调“议会道路”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可能方式。

一评说，“苏共二十大是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道路所走的第一步。”“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观点都是错误的，是违背马列主义的。特别是以‘反对个人崇拜’为藉口而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关于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是原则性的严重错误。”一评特别强调：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教导明目张胆的篡改，对十月革命道路普遍意义的否定。”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把美国政府及其头子描绘成反对好战势力的人，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帝国主义好战势力的代表。”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无异是说美国政府及其头子有可能不代表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有可能放弃战争和侵略政策，甚至有可能变成保卫和平的力量。”“二十大的错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使其受到修正主义思潮的侵袭，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叛徒都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和铁托集团一齐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是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占领了布达佩斯的关键时刻，（苏共领导）一度打算采取投降政策而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断送给反革命势力。……我们坚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坚决反对放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由八十一一个共产党出席的莫斯科会议，也是中苏两党论战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各国共产党在同年六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一次预备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同中共代表团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阿尔巴尼亚开始站在中共一边。到了莫斯科会议上，冲突更加明显。据一评中说，苏联的错误观点遭到反对而没有写进会议声明中，这些观点包括：“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使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达



到了新的阶段”；“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日益增长”；“低估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小集团和派别活动”，中共认为这实际上要求各兄弟党听从它的指挥棒，废除各党之间独立平等的原则，用多数压少数的做法代替协商一致原则。

中苏两党的冲突公开暴露于世，则是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周恩来在致词中表示：“公开地单方面谴责一个兄弟党不利于团结，不是严肃的马列主义态度。”这是中国的一般群众第一次在报上看到中苏两党的分歧。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新纲领，非常有限地提及了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对此，中共也作了最严厉的批评。一评指出，这一纲领“使二十大后苏共领导所推行的错误路线进一步系统化，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和平过渡’。……纲领粗暴地篡改马列主义的精髓，即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宣称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已不再必要，苏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并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荒谬理论……它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代替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纲领反对仍然生活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占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起来革命，反对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总之，这是一个保存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当年中苏两党决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关于南斯拉夫。三评中说：“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提议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时，我们同意把它当做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目的是希望它回到社会主义道路，并进一步考察铁托集团将如何演变。即使在当时，我们对铁托集团就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南斯拉夫的领导已经在同帝国主义勾结的道路上走得相当远了，它们很可能拒绝我们的努力而不愿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我们的预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铁托集团拒绝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已经一步步得到实现。在国际上，铁托集团越来越卖力地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马列主义政党对铁托叛徒集团应有的态度是彻底揭露和坚决打击。”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给铁托集团翻案，这证明他们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了一九六零年的声明，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欺骗南斯拉夫和全世界人民效劳。”

看了这些义正言辞的批判，人们对后来中共为反对苏联而建立起来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自然不会感到意外，但是谁能想到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同盟军，竟然就是中共当年口口声声指责苏共向其投降的“铁托集团”及“美帝国主义”呢？谁能预料到后来中共和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关系，远比苏联当年同它们的关系密切、友好得多呢？风云激荡的三十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竟然是如此地出乎意料。除了中国和美国、南斯拉夫关系的戏剧性转变外，还有一度作为“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和中国坚定盟友的阿尔巴尼亚同中国的反目，中国自称为其“大后方”的“反美前哨”越南同中国间残酷的边境战争，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柬埔寨波布特杀人政权昙花一现的成功和覆灭，最后就是东欧的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其中，还包括苏联为当年的镇压匈牙利民主运动而向匈牙利人民道歉，而匈牙利也为当年被苏联处决的纳吉举行国葬恢复名誉……。

在历史的事实面前，一评到九评中这些论点的可笑、荒谬是如此明显。事实上，中共后来自己也恐怕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在十三大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献《九评》竟不置一词加以检讨，大概是因为提起来实在太难为情。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坚决反对和多方牵制，赫鲁晓夫的改革在内外交困中终于流产失败。赫鲁晓夫开创的苏联民主改革，在停滞三十年后，才由一批被称为“二十大的儿女”一辈政治家，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重新承担了起来。这场历史的改革竟会一延就延迟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

## 二、个人因素：斯大林和毛泽东

苏共二十大的主题之一是批判斯大林。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说，“斯大林在其一生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这些错误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斯大林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心头的阴影，实为“反修”斗争乃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王若水《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探索》复刊一一至一一三期）。

如果根据这些断定毛泽东真是为了捍卫斯大林的声望，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毛泽东和斯大林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其一，斯大林一向怀疑毛泽的农民意识，在中共的派系斗争中对他持排斥态度；解放战争期间，斯大林曾主张中共和国民党妥协成立联合政府或划长江为界而治，反对中共解放全中国。对这些历史老帐，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据毛当时的俄语翻译师哲回忆，毛见到斯大林时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斥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知道毛想让他认错，马上把话题岔开顾左右而言他。以后毛一直想在斯大林面前一吐衷肠，倾吐胸中的怨气而始终不得机会。其二，毛迫切希望自己充当国际共运的最高领袖，他一直怀着同斯大林一比高低的强烈欲望，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贬低斯大林无疑对于提高毛自己地位有直接的好处。因此，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政治报告出来之初，毛泽东是高兴的。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苏共二十大作了充分的肯定。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很快敏感地意识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对于毛建立和强化自己个人崇拜，从理论上长远地看，是根本上不利的。因此毛泽东决定转而采取另一种抬高自己的策略：阻止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捍卫斯大林“伟大领袖”的名分，然后把自己定位成比斯大林“更伟大”的领袖。

毛一直坚持说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在晚年也多次说到后人能对自己三七开自己就满意了。但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平心而论，毛的历史地位恐怕还不如斯大林。其一，苏联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中国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少犯些错误，特别是同样类型的错误（这里暂不计较‘错误’和‘罪行’的法律含义的不同，姑且称之为‘错误’吧）。但毛泽东的错误并没有少犯，不但性质是同类的，并且在程度上更加变本加厉，如中国“大跃进”比之苏联的经济失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比之苏联的“肃反”。其二，以个人私生活道德而言，斯大林并无严重出格，而毛的个人生活完全是个十足的封建皇帝，对他人却不断提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彻底“斗私批修”，十足的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作为“反修”斗争发展高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和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揪出党内的赫鲁晓夫”。很明显，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的最大罪恶就是他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批判了个人崇拜。因此毛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机，可说就是防止有人今后否定他，特别是他知道自己发动的“大跃进”闯了饿死数千万人民的大祸，就更加担心后人否认自己。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生命”，毛为了掩盖自己的“大跃进”等错误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又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他越是不择手段地去维护自己的历史地位

，结果他的历史地位跌得越低。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写下“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词句，作为一个青年人有此雄心壮志，当然无可非议且十分可嘉。但作为一个领袖政治家，如果把个人的历史地位看得太重，乃至至于不择手段地去维护个人的历史地位，则往往会酿成个人和历史的巨大悲剧。毛泽东怀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雄心走出韶山，最终落得个“粪土当年救世主”的结局（这或许是太感情化的评价，但当我想起大江南北十来年的插队经历中耳闻目睹的，关于中国农民自公社化以后的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年中，一直在半饥饿状态中可怜地生存的事实，以及“大跃进”年代又活活饿死三千多万父老的事实时，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历史给予后人的教训是非常深刻而严峻的。

### 三、群体意识基础：“世界革命根据地”和“新华夏中心主义”

但是，仅仅挖掘“反修”发动者的个人动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如果毛泽东没有巧妙地利用社会基础，这场运动显然也是不会如此声势浩荡而旷日持久的。当时每发表一评，通过中央广播电台那义正词严、气壮山河的诵读，深深地感动、激动了多少人；听完广播之后通宵达旦的欢呼庆祝，第二天的全国性的停课、停工大游行，整个民族风靡地着了魔。我们回忆起这些景象，就可以知道整个民族进行反省的必要性。

一评到九评中的什么信息如此激动人心呢？是其中那“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的“新华夏中心主义”（刘青峰《文化革命中的新华夏中心主义》，《二十一世纪》第十五期）。

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代表了“天道”，那么苏联作为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来理所当然地占有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领导地位。一评到九评，明确地宣称苏联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中共为了维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正统性和纯洁性，正在进行不妥协的坚决斗争。这样，中共就自然取代苏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天道的代表，而中国也就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反修”斗争，就是这样地迎合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情结！

随着“反修”斗争的深入，这种新华夏中心主义也日趋具体。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林彪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一文中，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推广到全世界范围。该文说，“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样，就把中国革命定位为世界革命的雏形、缩影和预演。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毛认为“文化革命”是“反修防修”的好办法。该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公报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主义的新阶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传达中共最高决策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声称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正式把中国称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

作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九六八年，中国对外无偿援助费用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二，几乎等同于当年占财政总支出百分之六点二五的全国教育经费。这个数字是很不寻常的，考虑到当时有幸接受中国援

助的国家和政治组织数量之少（必须是被中国承认的社会主义国家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毛派组织）和中国的国家规模，这个数字就更加惊人了。例如当时阿尔巴尼亚，以人均接受中国外援的数目来看，全国人民不需工作就可以享受到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当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阿尔巴尼亚老百姓并未直接享受到此种援助的实惠。但各国的“毛派”组织，由于其成员人数极少，确实是完全地被这些援助养起来的。凡此种种，表明毛泽东的中共，对于自己领导世界革命的责任，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的，还的确是当真去作的。

后来林彪在《毛主席语录》的前言中则进一步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还多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天才。”

这样，跟着一个旷世伟人从事前所未有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国人的华夏中心情结就得到了空前的满足。无疑地，这种“从事空前伟大事业”的心态，是一种幸福的、令人陶醉的心态。中国大陆从去年年初开始兴起的“文革歌曲热”，其社会、心理的原因固然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回忆和陶醉于当年那种“跟着伟大领袖”“从事伟大事业”的飘飘然感情，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大陆文革歌曲热的事实提醒我们，对当事者个人的错误进行清算，相对来说，总还是比较容易的，（尽管我们今天对毛泽东个人错误的清算实际不仅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说并未曾认真地展开，还远不及当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程度。但可以相信这仅是个时间问题。）而对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整个民族的反省，却要艰难得多，这一点有必要加以反复强调。

“华夏中心”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确立了“诸夏用夷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的大原则，这可以说是华夏中心论的雏形。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华夏中心主义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政府”，华夏中心主义是大一统的文化基础。无疑地，华夏中心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国家的统一，有着无可置疑的价值，但是它对于现代世界中平等的文化交流和外交，却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的近代史，是中国人备受耻辱，华夏中心情结受到空前打击、压抑的时代。而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展开，使久遭压抑的华夏中心主义以更极端的形式得以复活。华夏中心主义实在是个很顽固的东西。今天，“反修”时代的新华夏中心主义虽然已经消亡了，但是，随着当前中国大陆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中国国力的增长，某种形式改头换面的“新华夏主义”是否会在出现呢？这是值得我们留心的。不过，心理学告诉我们，极端畸型的自大狂，往往是孤立和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后的产物。中国当前的经济成就，是和开放和引进外资、外来技术分不开的，这使得我们可以相信，将来虽然会有别种形式的新华夏主义出来，但不至于采取太极端的形式和成为大气候。由此可见，开放政策不仅于经济、技术上对中国大陆有好处，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具有极其深远的良性潜移默化作用。

另一方面，当年那种狂热的“世界革命中心论”，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其丰富精力、创造力和理想追求得不到正常落实状况下的反常渲泄，可说是穷极无聊的表现。如今中国大陆社会日趋多元化，青年人的精力和想象力也有了较多的发展渠道，如发财、成名成家（这些在改革前的中国大陆都是“反修”批判的重要对象），这也是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料极端的新华夏主义不至于再次大肆泛滥。我们所进一步希望的是，尽早彻底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令人民之丰富创造力得以更自由的多元发挥、实现，这才能有效防止任何一种异化的极端思想泛滥成灾。

#### 四、“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和新愚民主义

中共当年指控“苏修”的主要罪行之一，是“苏修”向“美帝国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南斯拉夫讨好、投降。但后来又声称苏联搞“霸权主义”。投降主义和霸权主义显然是没有共通之处的。事实上中共建立的“反修国际统一战线”中，就包括了美国 and 南斯拉夫。这就证明了当时的“反修”斗争有口是心非不便告人的背后另一面。自然，作为国际和外交战略，从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这样也许有其合理和机智的一面。这样的国际政治游戏，有必要通过全民的政治学习把全体人民拖进去陪“玩”吗？

同斯大林时代的“肃反”等政治运动主要由克格勃执行不同，毛泽东的更热衷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或许有进步的一面，克格勃是杀人不眨眼的，而“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专政”虽然时有迫害至死的情况，但一般说来，直接处死的案例相对来说仍属反常和少见。毛泽东说过，人头不是韭菜，割了不能再长，所以他对于杀人，总的来说比斯大林慎重得多。但毛泽东的这种仁慈没有超出“妇人之仁”。此外，他之所以少杀人，还出于“留作反面教材”“化毒草为肥料”，随时拿出来作活靶的阴沉谋算的。就受迫害者的痛苦程度而言，毛对于政敌所施加的慢性折磨，恐怕超过斯大林对政敌的一枪解脱。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政治学习运动”，其负面社会效果更是不可忽视的。当人们对因为给苏联专家提点意见就被打成“右派”还记忆犹新，好不容易才“想通”接受了苏联代表绝对正确的概念时，突然展开对苏联的批判，思想上要转过来有点困难的。但毕竟“反修理论”迎合了群众潜在的“华夏中心”情结，较多诉诸感情，还较容易为群众接受。如果说群众为理解“反修理论”付出的精力还比较有限的话，那么，在伴随着“反修”运动展开的空前规模的“雷打不动”的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为了“理解、领会”伟大领袖那些无所不包的庞杂思想，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计算的了。

事实上，载负毛泽东思想的“雄文四卷”，大多是政策文件和军事电令。这些历史资料，对于有关的政治学者或历史研究者，自然有极大的研读价值。但要命令各行各业的普通老百姓一起来反复地长期地研读，实在是对社会智力资源的粗暴滥用。被迫多读多想的结果，必然产生许多这样那样形形色色的想法、体会。其中有的得到官方首肯，于是作为典型褒扬（但由于官方的政策变化多端，往往这次运动中的标兵，到了下一次运动就成了批判对象了）。有的理解不合时宜，受批评还在其次，弄不好还会被当做“故意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处理。仅落入这一文字狱中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笔者记得当年在工厂里学习他老人家“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豪言壮语，工人老大粗不甚理解，于是一个技术员具体解释道，“现在美国的宇航员不是已经登上了月球吗？苏联的核潜艇不是已经在五大洋海底游来游去了吗？只要科技上去，登月、下洋都是可以实现的。”也许是工人门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具体而有启发，也许是登月、下洋对于一些人还是挺新鲜的事情，于是这段话就传开去了。这个技术员随即就被戴上“恶毒歪曲毛主席诗词，为美帝、苏修评功摆好”的帽子送到北京第九监狱去进一步脱产深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了。

当然大多数人是不能也不敢去作“创造性的理解、诠释”，强迫他们成年累月地坐在冷板凳上学习，除了无端空耗时间之外，就是深深体会到有权就有理这种权力拜物教的可怕强大，许多人因此变得世故圆滑、玩世不恭，另一些则因此养成满口革命原则而满肚子争权夺利算计的双重人格。败坏社会风气、民族道德甚者，莫过于此也！

某些特别认真地把掌握领袖思想当做人生主要价值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几乎是全部的精力，其结果往往是悲剧的。例如八九民运领袖周舵的母亲：“一个刚强、自信、生气勃勃、充满理想的积极女性”，纯粹由于冤狱，“文化革命”中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五年半岁月。在那里，她的一头乌发变为白发，不仅肉体，连思想也得到了彻底改造，终于“理解”和彻底接受了伟大领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她衷心感谢对她的“挽救”，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诚拥护者。她感到虽然吃了苦，但认识了真理，这样就得到了心理平衡。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和“文革”理论的被抛弃，她完全蔫了、懵了，可悲地感到自己所吃的一切苦头，都完全白吃了，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这成了她最终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九一年八月号《明报》）。像这样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多，但因为当年过于认真地学习领袖思想而如今悔恨不及的人却是随处可见，他们当年把掌握毛泽东思想当做要务，不论是出于想掌握真理的真诚愿望，还是出于适应社会以图生存、以谋发展的个人动机，如今都在为自己在市场经济中一无所长、难以谋生而深深悔恨当年的虚度年华。

是否有人真学好了毛泽东思想呢？一度被公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标兵的两个人：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说啥俺干啥”的雷锋，学习领袖思想的结果是失去自己的思想。另一个“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可靠的接班人”，“毛主席划圈我划圈”的林彪，结果学成了一个两面派、阴谋家。林彪被毛泽东当做接班人精心培养，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条件可说是天下第一。同样学习条件特好的还有江青，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年，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最多的机会沐浴伟大导师的雨露阳光，结果也是学成个反革命（至少中共官方这么说，也许是冤枉的，她自己至死不承认反对自己的丈夫毛泽东）。可见学好我们伟大革命导师的思想是多么困难了。现在中共领导人中有人敢声明自己已经完全学好、理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吗？

最令人感到糊涂的是毛泽东本人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竟发动了一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黑暗一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据中共官方的一个说法是主要是混淆了敌我（邓小平本人就被毛泽东一度错当做敌人）。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就赫然写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见连毛泽东本人也没能学好毛泽东思想中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官方解释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主观愿望是好的，不过是没有搞清什么是修正主义而已。“没有搞清”有两层意思。一是“不知修正主义为何物”，那么号召全体人民批判一个自己有不知为何物的东西，至少是极其不严肃的。“没有搞清”的另一层意思是“错把另一个东西当修正主义”，那么，毛泽东显然是把开社会主义阵营民主进步改革之先声的苏共二十大纲领当做修正主义去讨伐的，所以毛的“反修”，实质上就是“反改革”就是“反（历史潮流之所）动”。毛泽东心目中具体的“修正主义分子”，皆为彭德怀、刘少奇这些能够或比较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关心人民疾苦的人，他的“反修”，实质上又是“反对实事求是、反对关心人民疾苦”，这样的动机，也可算正确、善良吗？我们切不要被漂亮的表面和词句迷惑而看不到问题的实质。

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毛泽东真的相信他的那套“反修”、“文革”理论，那还情有可原，犹如希特勒之相信种族主义，至少他本人是真相信的。但毛的“反修”和“文革”主要是出于维护个人迷信的个人动机，事实上他自己未必相信，苏联真的是在向帝国主义投降以及刘少奇等是“内奸、工贼”的指控。将自己也未必相信、无可理喻的歪理强行灌输给人民，这就像逼着别人想通“二加二等于五”、或如秦二世时奸相赵高指鹿为马后逼着群僚一起首肯一样，是非常险恶的，不过现在指鹿为马的不是第二把手，而是最高领袖自己了。赵高的指鹿为马当然还是政治权

术，他还没有走到要普天之下的老百姓也跟着指鹿为马的程度。而毛泽东号召“八亿人民都要作批判家”，他的指鹿为马却是进一步扩大到全民范围了。

“文化大革命”中有所谓“陪斗”一着，这是对专政对象或潜在的专政对象的一种精神虐待和恐吓。其实那个时代中八亿人民都在“陪斗”，陪着中共上层权力斗争而展开一场全民的内斗。五四时代的进步文人曾把封建礼教社会称为“人吃人的大宴席”，“反修”、“文革”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仅是宴席，而且成了一个“大戏台”，全体人民被迫一起作假演戏。古罗马的贵族以观看奴隶角斗而取乐，二十世纪的自比凯撒的毛泽东则以挑动全民内斗为能事。这确实是对人民的史无前例的大愚弄！

## 五、廿年一场“反修”剧，千秋万代反思课

无疑地，毛泽东本人要对“反修”的“文化大革命”负相当的责任。“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权力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任何思想，不管它原来多么好多么伟大，一旦被定为一尊，就必然成为压制新说的势力，并且又由于自我封闭的宗派主义，必然使其自身也同时走向僵化、教条。中共七大的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最高指导思想，实在是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极权主义的政教合一，是一种极端的一元论。看来，中华民族要从大一统观念、一元论中彻底解放出来，必须来一个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百家争鸣”复兴运动。自从儒家被定为一尊，作为官方法定意识形态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就失去了蓬勃的生命力。

固然，儒家若主要作为一种个人伦理修养的理论，自有相当可取之处。然而，就治国而言，它的高唱“天下为公”高调，实在还比不上主张产权明确、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辩护的杨子学说。它的将等级次序神圣化和束缚个性的消极面，也可以藉主张兼爱、博爱的墨家以及主张个性解放、返朴归真的老庄道家加以平衡。唯有“百家以争鸣，多元而平衡”的动态开放文化，才是防止任何一种极端思想泛滥成灾、主宰一切的根本文化保证。在这方面，在我国“百家争鸣”时代的文化遗产中，是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开发出来古为今用的。

“反修”时代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年左右，然而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空前苦难却在我们心头留下了难以痊愈的伤口！有道是“二十年一场‘反修’剧，千家万户长恨歌”。但是，仅仅抚摸那些个人的痛苦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对民族的浩劫作深刻而久远的反思。所谓“久远”，一方面是指在未来的久远岁月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反思；另一方面，则是我们需要对这场浩劫的根源作历史的久远反溯。我们唯有深刻地作痛定思痛的反思，才能避免“反修”、“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

□ 原载1993年8月《探索》杂志

~~~~~

【读者回响】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也说封杀不了的造反派历史

• 赵淮海 •

华夏文摘增刊（zk9807a）里刊登了广州造反派头子刘国凯著《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中的一章，题目叫《六六年夏——灾难向民众》。刘著全文刊载于《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丛书》第一辑，《封杀不了的历史》。

从刘国凯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这些当年的造反派头子对自己过去行径毫无反省的“执着”。在该文结尾处，刘国凯说：“文革结束后，有许多文艺界人士谈及

那段恐怖的岁月，心有余悸也愤恨万分。他们一致痛斥红卫兵、造反派的凶残暴行。……呜呼，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人的高风亮节？”

为防断章取义之嫌，此处抄得过于繁琐。其实刘国凯的意思可以很简单地说明，那就是文革受害者应该把仇恨记在“血统论红卫兵”的头上，而不应该记在“造反派红卫兵”的头上。因为“造反派红卫兵”也是无辜受害者。而文艺界受害者之所以混淆了阵线，把“造反派红卫兵”和“血统论红卫兵”一马勺烩了，是因为他们在文革结束后得到了“血统论红卫兵”的父兄，那些“老走资派”给予的特权收买。

为了行文方便，我这里将刘国凯的“血统论红卫兵”简称“老红卫兵”，而把刘国凯的“造反派红卫兵”，简称“造反派”。笔者之所以爱用“老红卫兵”，因为我自己就是“老红卫兵”的一员。我的“老红卫兵”情结就如杨小凯愿意将自己所属的早期造反派称为“老造反派”的情结一样。

老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他们勃兴于1966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撤退工作组的通知，终结于该年十月《红旗》十三期社论；前后两个半月。而实际活跃期仅只一个“红八月”。九月初，得风气之先者已开始串联。从“八一八”开始，到该年国庆节，红卫兵更醉心于四次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过了十一，老红卫兵就倾巢出动，大串联去了。

刘国凯的文章里说：“广州的‘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也于八月下旬展开。若以北京作参照物，广州‘红色恐怖运动’的严酷性轻得多。”在整个“破四旧”时期，北京总共打死、逼死、迫害致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毛泽东有秦始皇、汉高祖等开国皇帝之智计，把位高权重，有独立开辟根据地能力的老干部一批批，一级级调入京城；既便于控制，也防止他们继续在外地发展势力，抗衡中央集权。文革中“揭露”贺龙曾在四川奉调入京之际说了句戏词：“杯酒释兵权，一声调进京。”到文革开始时，各大军区司令都已换成上将衔。元帅衔的则只当国务院的部长，大将衔的更在国防部下属单位任职。中共老干部以北京最为集中，所以北京市的干部子弟也最多，老红卫兵的数量自然全国第一。外地“破四旧”有之，但鲜闻打人致死者。全国“红八月”“破四旧”致死的人命总数至今未明，而实际北京致死的这一千七百余人已经与总数相差不多了。

看看文革开始时，北京已有的首都城市建设规模之大，如十大建筑等，与外地很少有新的城市建设之比，就可估计出北京老干部数量与外地老干部数量之比。由此可以类推出北京干部子弟的数量，老红卫兵的数量，老红卫兵“破四旧”致人死命数量与外地相对应的数量之比。这是一连串互为因果，互相依赖的数字，而不是各自独立的变量。

以北京老红卫兵为主的“破四旧”运动，猖狂三个月，致死两千人。而整个文革期间总共有“两千一百四十四万余人受到审查、冲击；一亿两千三百余万人受到牵连、影响；四百二十余万人曾被关押和‘隔离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在武斗中有二十三万七千余人死亡，七十三万余人伤残。七万一千两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了。”北京老红卫兵“破四旧”致死的一千七百余人大约只占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一百七十余万人的千分之一。

文革十年，并非天天都这么死人。除了“红八月”这第一个死亡高峰以外，68年还有一个更大的死亡高峰。造反派勃兴于66年10月的老红卫兵倒台，到69年4月1日愚人节开幕的中共“九大”，标志着造反派夺权的全面胜利。然后新老造反派之间又继续伙并，争权夺利。到71年“九一三”事件，相对不特别激进的林彪集团被更其激进的四人帮集团所败。这之后毛泽东有感于造反派太不成事，

从而醒悟到对老干部打击过甚，遂开始很不情愿地逐步“解放”老干部。到76年毛泽东大限归西，四人帮就擒为止，则是被重新启用的老干部和造反派之间互为消长的五年。毛泽东在其间搞平衡政治，再也不一边倒了。这里有他自己的难言之隐。临死前毛老爷子说自己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第一是抗战和把老蒋赶到一群海岛上去，第二件就是文革。他老人家并自己承认，非议第一件事者寡，非议文革者众。

1966年十月，《红旗》十三期社论以极其严厉的口吻将老红卫兵“红八月”的“破四旧”运动指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老红卫兵的爹娘。这对于颇负优越感的老红卫兵来说，无疑是当头一闷棍。我本人对“破四旧”运动并不感兴趣，并特别反感把名画撕成碎片的文化破坏（见拙作《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华夏文摘·zk9605b）；但与两个半月前全力支持老红卫兵的“大方向正确”相对比，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居然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到这般地步，却也大出我的意料！

这一闷棍固然打得我晕头转向，但随后的余痛却使我猛醒：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都是人。他们大小便的姿势一点也不会比我更幽雅，或更威武雄壮。凡人所有的一切毛病他们都会有，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其不讲信义更无人能阻拦得住。——我的醒悟不迟于1966年底。

“破四旧”的当时我就不以为然，但轮到造反派批斗我时，却从无区别对待。我这才明白了什么是“大方向正确”的精髓。看到造反派“翻身”之后的嚣张，我心里想着明朝《京师人为严嵩语》里的名句：“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还有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别看今天闹得欢，留神日后拉清单”。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拿老红卫兵开涮的下场，早晚也会轮到造反派头上！

但仍出我意料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到69年4月的中共九大，造反派整整在中国猖狂了两年半！而且其后继续延伸到76年10月四人帮就擒，“造反派”三字才最后和“老红卫兵”四字一样成为贬义词。“造反派”作为无上荣光的褒义称号，在中文词典里整整风行了十年；五十倍于“红八月”“破四旧”的“老红卫兵”。

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中央机关司局以上干部，省市级处长以上干部，地区级科长以上干部全部被打成“走资派”；副教授以上，工程师以上，副研究员以上亦全部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连同等级运动员和等级演员一起，惨遭批斗，无人能免。

两千万人遭受冲击，株连一亿。刘国凯置造反派以五十倍长的时间、千倍于老红卫兵的致人死命数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于不顾，竟然到现在还唱着《红旗》十三期社论里的老调，以老红卫兵“红八月”的猖狂来反衬造反派的“无辜受害”。《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的当时，情况确是如此。但自从该社论发表之后，造反派成立的那一天起，他们就不再是无辜受害者而“翻身”成为更大规模的迫害者了。

造反派在文革中胡作非为的时间之长，覆盖面之广，程度之深，致死人命的数量之巨大，不但早已淹没了《六六年夏——灾难向民众》的“红八月”时老红卫兵“破四旧”的胡作非为，而且淹没了文革前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胡作非为的总和。76年的10月，正好是中央文革以《红旗》十三期社论来鼓动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十周年。以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核心的四人帮就擒之际，举国上下，竟是奔走相告。这大概是中共建政以来唯一一次没有经过组织动员来庆贺的“大快人心事”。

在 66 年“红八月”时，北京老三届的高初中生的人数分布比大约是 1：2。高三生的平均年龄十九岁，高二生平均十八岁。也就是说高中生里有一半的年龄在十八岁之上。或者说老三届当时只有六分之一的人够了十八岁法定成人年龄。老红卫兵是老三届里的子样本，其年龄分布当然也只有六分之一的人够了应当刑责自负的法定年龄。到 67 年底，老三届里够法定成人年龄者三分之一；68 年底，一半老三届年满十八岁；69 年三分之二年满十八岁；到 70 年底，全部老三届都达到了法定成人年龄；而这时正处在造反派猖狂的时期。也就是说，首开不公平报复的老红卫兵里有六分之五的人可以犯罪的当时不够法定年龄为由，免于刑事追究；而重开不公平报复的造反派却绝没有这么高的比率以不够法定年龄来推卸刑事责任。

除了“批斗”和“私设公堂，逼死人命”这两个老红卫兵与造反派不分彼此的罪行以外。老红卫兵直接拷打致死人命的事，在造反派里相对比较少见。但造反派发动武斗的战争罪行又是老红卫兵所从不曾有过的。仅造反派武斗造成的二十三万七千余人死亡，就是北京老红卫兵致死人命总数的一百三十余倍！——还外加七十三万伤残。

“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广州造反派头子王希哲在其自传《走向黑暗》里讲到自己当年指挥武斗时，如何下令就地枪毙投降者。事后王希哲却并未因此而服刑。撇开王希哲组织武斗，不宣而战的战争罪行不谈，他下令就地枪毙投降者，以血债血偿，一命抵一命算，也够个死刑了。而王希哲现在却是名满天下的“人权斗士”，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六四过后，本来势之所在，理当欣欣向荣的海外民运却日见消乏。大批逃亡出来的前造反派的加入，使民运更多地蒙上了早已声名狼藉的造反派色彩，应该是最主要的内在原因。造反派不但没有反省，也没有吸取教训，行事规则仍是依然故我的“造反派脾气”。刘国凯的强辩只能适得其反。

本人完全赞同首届“联动”大会上放映的苏联电影《区委书记》里的口号：“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在以刑事法处决一千七百七十二名致人死命的老红卫兵里六分之一的同时，处决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名致人死命的新老造反派！

□ 寄自美国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吴 放（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暴瑞贤（芬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cnd-cm@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GB 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 版）
并请注明：SUB（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 T P）：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 W W）：http: //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